

老龄化视角下家庭商业保险持有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 CHFS 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卢亚娟 王家华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江苏南京 211815)

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人口老龄化的逐步到来,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实施已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商业保险作为其中的支柱力量,需要受到足够重视。分别运用 LOGIT 模型和 TOBIT 模型从家庭基本特征、经济特征以及外部环境 3 个因素出发,对城乡家庭商业保险持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健康状况、年收入及房屋租住 6 大因素对各类家庭均具有显著影响;从城乡样本来看,城镇家庭更易受到婚姻、负债及风险偏好度的显著正向影响,而农村家庭更易受到幸福感的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商业保险;城乡居民;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中图分类号:C924.24;F8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8)01-0025-06

一、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逐步到来,商业保险在家庭养老保障体系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方面,作为金融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保险填补了社会保险所存在的短板,满足了市场对于保险产品的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融资工具,商业保险丰富了我国金融市场的融资渠道,并为居民提供了多样的金融产品,进一步完善了金融体系,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根据 2017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2016 年底,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3 086 万人,占总人口的 16.7%;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15 003 万人,占总人口的 10.8%。按照 1982 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标准,以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是否超过 10% 作为国家进入老龄化国家的标志,中国已经是严重老龄化的国家。显而易见,老龄化将对我国居民家庭结构产生显著影响,并进而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目前,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主要包括 3 大体系:一是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这是通过立法规定的、对于符

合相关规定的居民必须购买的强制性养老保险制度,正在逐步实现全覆盖;二是企业年金,是经济实力较强的企业为其员工提供的退休养老福利,由于只有极少部分人拥有,虽然具有一定的保障作用,远远不能实现广泛覆盖;三是商业保险,是个人根据自身经济情况自愿购买的具有补充性的商业性养老保险制度。面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国商业保险面临着巨大的社会机遇。现阶段,我国养老保障体制仍然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主,随着社会养老负担的加重,政府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从养老基金运营中逐渐退出,依靠现代金融市场建立涵盖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私人储蓄和商业保险相混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党的十八大提出,到 2020 年要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2013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总体要求和政策措施,明确了商业保险作为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2014 年,《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的提出,进一步明确商业保险在我国保险市场中的重要地位;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

收稿日期:2017-07-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17ZDA072);江苏科技金融体系创新研究基地(2012XWJD008);江苏省重点序列学科应用经济学(苏政办发[2014]37号);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金融学(苏教高[2015]11号)

作者简介:卢亚娟(1966—),女,江苏宜兴人,教授,从事区域金融和家庭金融方面的研究。

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虽然我国内需空间足够且国家进行政策鼓励,但我国保险业发展仍不够强劲,主要原因是我国居民投保意识不强,对保险产品的购买意愿有待进一步增强。因此,运用 LOGIT 模型和 TOBIT 模型,从我国居民家庭商业保险持有的广度及深度两方面出发,探究其影响因素以及城乡居民间所存在的差异,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商业保险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保险需求以及影响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因素。保险需求方面,Michel 等通过使用美国保险购买政策数据库和美国相关机构提供的企业客户及保险提供者的部分数据信息对当地恐怖主义保险展开研究,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到公司对财产保险需求价格缺乏弹性的结论,并发现多数情况下,公司会通过子公司来进行自保^[1]。在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影响因素方面,国外学者从各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在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国外学者大多认为其会影响家庭对商业保险的参与决策,如 Albouy 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收入或资产积累越多的家庭会有更高的商业保险购买意愿^[2]。其次,人口特征因素方面,主要包括金融知识的积累、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以及户主性别等,学者认为这些特征间的差异也会影响家庭商业保险持有行为。Showers 等通过使用美国相关数据分析发现,家庭对保险的需求程度主要受收入及户主年龄等的正向影响^[3]。最后是居民主观态度因素,主要包括户主的风险偏好及社会信任等方面。Durlauf 通过对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社会互动活跃度会显著影响家庭保险购买决策^[4];Bernheim 等提出,金融知识积累越多的居民,其家庭储蓄水平较高、家庭财富积累也相应提高^[5];Schmidt-Hebbel 认为在养老金支付体系中,用现收现付制来取代完全基金制可以提高要素市场潜在的效率,从而提高储蓄率^[6];Lusardi 关注老年金融保险,主要根据金融资产收益率、护理保险、老年金融能力、金融选择和金融权益保护等行为设计金融保险产品^[7]。

国内学者大多从商业保险中的某类保险出发进行研究,或者是对某种保险产品的购买人群进行研究。孙伟等利用 2001—2011 年除港澳台及西藏之外的全国 30 个省的面板数据,提出房价波动对家庭人身保险的需求有负向影响^[8]。赵红梅等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显著影响家庭财产保险需求的因素,并从地区间差异性出发提出收入、投资及人口数对家庭财产保险的

需求具有显著影响^[9]。国内学者在对某种保险产品 & 购买人群进行研究过程中虽然分析都较详尽,但普遍存在实证结果可靠性受样本数据以及调查过程中可能存在误差等方面限制。孙正成通过对浙江省 17 个县市样本数据的分析掌握了当地居民对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情况,提出浙江省可尝试设置针对性的社保型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建议^[10]。黄瑞芹利用相对贫困的部分民族自治县的样本数据并结合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对农户养老保险的需求状况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农户家庭的商业保险持有行为与其内在意愿并不完全符合^[11]。龙梦洁认为,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带来很多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应该进行养老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主张政府逐步退出养老的某些领域,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性质的养老保险方式应该逐步加强^[12]。杨宇提出,商业养老保险可以提供精算技术支持和养老年金的支取服务,有利于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服务水平^[13]。李强等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现收现付养老保障体制下,包括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养老保险系统可以提高养老资源的配置效率^[14]。刘敏认为,可以向老年人提供商业性年金、护理保险产品、老年资产投资和管理服务^[15]。

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商业保险作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环节,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为此,基于全国数据,运用 LOGIT 模型和 TOBIT 模型,从家庭基本特征、经济特征以及外部环境 3 个因素出发进行实证分析,以系统分析我国居民家庭商业保险持有广度和深度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细化城乡差异,为完善我国保险理论体系提供一定经验证据。

三、数据来源、基本模型与变量说明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以下简称为 CHFS)。CHFS 在全国除西藏、新疆、内蒙古和港澳地区外的 2 585 个市/县进行了数据调研,并于 2013 年获得 28 143 户有效数据^[16]。此次研究从 CHFS 数据库中选用家庭基本情况、家庭金融资产及家庭保障等相关数据,在去除严重缺失值及异常值后,使用 28 095 个家庭进行研究分析,其中包括农村家庭 8 932 个、城镇家庭 19 163 个。

2. 家庭商业保险持有概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之一就是发挥商业保险在居民家庭养老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纵观我国保险公司在 2005—2015 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规模在逐渐壮大,但增速仍较缓(图 1)。从图 1 可知,我国保险公司机构数已由 2005 年

的93家增至2015年的194家,保费收入也由4927.34亿元增至2015年的24282.50亿元^[17]。虽然我国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在通货膨胀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得到飞速增长,但保险公司机构数在十年时间里仅增长为原来的两倍。



图1 2005—2015年我国保险公司机构数及保费收入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调查员详细记录了每位家庭成员的包含商业保险在内的各项保险购买情况。在分析过程中设定,若所有家庭成员中至少出现一人持有商业保险中的任何一项保险,且该保险的投保人为受访者或其家人,则判定这一家庭拥有商业保险。

表1不仅列示城乡家庭的基本信息,而且呈现样本家庭中拥有商业保险家庭的占比情况及城乡间差异。首先,在家庭基本特征方面,女性、患病或未婚的户主占比均较小,且年龄普遍偏大,同时在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实施后,居民受教育年限也得到有效提高,达到9.37年。城乡居民间存在巨大差异,农村家庭不仅在女性户主占比及受教育水平上远低于城镇家庭(仅达到其一半的水平),且家庭成员患病人数以及已婚户主的占比均高于城镇家庭,这主要由于农村地区落后的教育资源和相对短缺的医疗设备。其次,在家庭经济状况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居民收入水平逐年攀升,居民家庭年收入均值达到了5.68万元,且拥有金融资产的家庭中其资产持有量均值达到4.91万元。农村家庭年收入均值仅为3.47万元,仅达到城镇居民家庭年收入均值的一半,且其金融资产持有量均值1.53万元更是远低于城镇家庭的7.57万元,这与我国经济发

表1 城乡家庭概况

变量	标准		
	全样本	城镇	农村
女性占比/%	0.24	0.31	0.12
年龄均值/岁	51.34	50.22	53.70
受教育年限均值/年	9.37	10.50	6.90
患病人数占比/%	0.16	0.12	0.24
已婚占比/%	0.92	0.90	0.96
家庭年收入均值/万元	5.68	6.71	3.47
家庭金融资产均值/万元	4.91	7.57	1.53
拥有商业保险的家庭占比/%	0.18	0.22	0.10
家庭数/户	28095	19163	8932

展二元结构化密不可分。最后,在商业保险持有方面,从全国样本来看,拥有商业保险的家庭占到了18%,农村家庭拥有商业保险的占比为10%,还不到城镇家庭中持有商业保险占比的一半。综上所述,相比于其他国家,我国商业保险的发展仍有巨大空间,且城乡间所存在的差异性不容忽视。

3. 模型与变量

为更准确得出影响家庭商业保险持有行为的因素,拟构建两个实证模型进行分析。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家庭是否购买商业保险以及商业保险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占比,前者主要采用LOGIT模型,后者主要采用TOBIT模型。

其中,LOGIT模型的表现形式如下:

$$P(Y_{ki} = 2 \mid X_{kji}\beta_{kj}) = F(\beta_{kj}X_{kji} + \varepsilon_i) = \frac{1}{1 + e^{-(\beta_{kj}X_{kji} + \varepsilon_i)}}$$
 (1)

$$F(\beta_{kj}X_{kji} + \varepsilon_i) = F(\alpha_0 + \beta_0sex + \beta_1job + \beta_2marriage + \beta_3age + \beta_4education + \beta_5people + \beta_6health + \beta_7income + \beta_8farm + \beta_9scale + \beta_{10}house + \beta_{11}risk + \beta_{12}happiness + \beta_{13}trust + \varepsilon_i)$$
 (2)

在分析家庭商业保险持有深度方面,运用TOBIT模型。与LOGIT模型的表现形式一致,两者的区别在于,LOGIT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取值仅为0和1两种情况,而在深度分析中,由于商业保险占比只能观测到正向数值,因此采用断尾回归的TOBIT模型,被解释变量取值为大于或等于0。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含义分别如下:

①家庭基本特征方面,户主性别(sex)、就业状况(job)、婚姻状况(marriage)均按照“0-1”的赋值方法进行了如下虚拟变量化处理。男性为1,女性为0;职业若为“退休、失业、下岗、自由、其他”则赋值为0,其余职业赋值为1;已婚为1,未婚为0。已婚有工作的男性户主对未来的保障意识更强烈,因此,更倾向于购买商业保险^[18]。户主年龄(age)、受教育程度(education)、家庭人口数(people)分别按照其实际岁数、最高学历以及实际家庭人口数进行赋值,其中根据当前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对受教育年限进行了数值化,分别将“没上过学”赋值为0、“小学”为6、“初中”为9、“高中及中专或职高”为12、“大专/高职”为15、“大学本科”为16、“硕士研究生”为19、“博士研究生”为23,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高且家庭人数越多的户主,其金融知识越丰富,越容易信任保险机构,且更需要考虑后续保障,因此更倾向于购买商业保险^[19]。在判断决策者是否患病(health)过程中,受访者需要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与同龄人比较后作出判断,分为“非常好”“好”“一般”“差”“非常差”,并定义当其健康状况为差

或非常差时,赋值为 1,反之为 0^[20]。

②家庭经济状况方面,除日常生活费外,家庭总支出主要包括医疗支出、教育支出以及农业生产费用,由于在家庭基本特征中已加入受教育程度及患病情况两个变量,为了避免内生性的存在,在这一方面仅加入了农业生产费用作为支出项。家庭年收入(*income*)以及农业生产费用(*farm*)分别指的是上年总收入以及农业总支出;家庭负债(*scale*)是虚拟变量,通过询问受访者是否存在负债来定义,若有则为 1、无则为 0。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推断,年收入越多、农业生产支出越多且有负债的家庭在收入足以满足家庭日常支出的情况下,会更考虑后续保障问题,更有意愿购买商业保险。家庭所在的房屋是否租住(*house*)这一变量的设置也是根据吴卫星等^[21]的研究成果进行设置,若为租住则为 1,自有则为 0,并预测其对家庭商业保险的购买具有负向影响。

③户主主观态度方面,户主的风险偏好(*risk*)、幸福感(*happiness*)均是通过直接询问受访者获得。答案如下:高风险高回报(很不幸福)、略高风险略高回报(较不幸福)、平均风险平均回报(幸福)、略低风险略低回报(较幸福)以及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很幸福),并分别赋值 1-5,越不愿意承担风险且对现状越感到幸福的户主会更想要维持这种状态,因此,会更希望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确保未来生活得到保障。对于社会信任度(*trust*),主要通过投资决策者自身对社会信任情况的打分来数值化这一变量。在这一问题中共设置以下 5 个答案: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一般、不信任以及非常不信任,分别赋值 1-5。只有当户主信任社会相关机构时,才会考虑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来满足自身对未来保障的需求,因此预期这一变量将负向影响家庭商业保险持有行为。

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设置及其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方向见表 2。

表 2 家庭商业保险持有行为影响因素及预期作用方向

变量	变量具体定义	预期作用方向
<i>sex</i>	男性为 1,女性为 0	+
<i>job</i>	就业为 1,退休、失业、下岗、自由等为 0	+
<i>marriage</i>	已婚为 1,未婚为 0	+
<i>age</i>	户主年龄	+
<i>education</i>	户主受教育程度	+
<i>people</i>	家庭人口数	+
<i>health</i>	若户主健康状况为差或非常差时为 1,反之为 0	+
<i>income</i>	家庭年收入	+
<i>farm</i>	家庭农业生产费用	+
<i>scale</i>	是否负债,是为 1,否为 0	+
<i>house</i>	房屋是否租住,是为 1,否为 0	-
<i>risk</i>	户主风险偏好度	+
<i>happiness</i>	户主幸福感	+
<i>trust</i>	户主社会信任度	-

四、实证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研究家庭商业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分别从家庭对商业保险持有广度及深度两方面出发,并依据全样本、城镇样本及农村样本分别构建实证模型。

为确保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对各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数值均远小于 10,即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且模型构建后,各模型 LR 值的 P 值均低于 0.1,表明模型稳健。同时,为了规避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在回归分析过程中采用了稳健标准误,使得实证结果更为可靠。

在探究家庭商业保险持有广度方面,将是否购买商业保险作为被解释变量,实证结果如表 3 所示。在探究家庭商业保险持有深度方面,将商业保险额占家庭总金融资产额的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实证结果如表 4 所示。经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①从全样本角度来看,无论是家庭商业保险持有广度还是深度,户主性别、就业及婚姻均会给家庭的商业保险持有行为带来显著正向影响,这与预期方向一致。但分别观察城镇及农村家庭样本可以发现,两样本间具有显著差异。城镇家庭在婚姻及就业方面表现出已婚且已就业的户主更倾向于持有商业保险,在家庭总金融资产中也更倾向于投入较多的资金到商业保险中;而农村家庭仅受到性别及就业分别对其商业保险持有广度及深度的微弱影响,虽然其作用方向均与预期一致,但表明这 3 类家庭基本特征并不是农村家庭商业保险的持有行为受影响的主要因素。

②无论在家庭商业保险持有的广度还是深度方面,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及健康状况 4 个因素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虽然这 4 个变量在城镇家庭及农村家庭样本中也均表现出显著影响,但农村家庭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在家庭商业保险的持有深度方面具有负向影响,与预期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我国近年来不断出台的惠农政策,国家对现存二元发展结构不断重视,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险体系得到不断完善,在同等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家庭虽然会有更高的商业保险购买积极性,但更愿意通过降低家庭金融资产中商业保险的占比来提升家庭风险类金融资产的投入,从而进一步提升家庭收入水平。总之,这 4 个家庭基本因素不仅是城镇家庭,而且是农村家庭商业保险持有行为显著影响因素中的重要部分。

③在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家庭年收入及负债情

表 3 家庭商业保险持有率影响因素概况

变量 标准	全样本		城镇		农村	
	系数	P 值(标准误)	系数	P 值(标准误)	系数	P 值(标准误)
sex	0. 83 ***	0. 00(0. 04)	0. 90	0. 71(0. 05)	0. 72 *	0. 06(0. 12)
job	1. 01 **	0. 05(0. 06)	1. 21 ***	0. 00(0. 09)	1. 06	0. 60(0. 18)
marriage	1. 82 ***	0. 00(0. 19)	1. 67 ***	0. 01(0. 19)	1. 77	0. 14(0. 77)
age	0. 97 ***	0. 04(0. 01)	0. 98 ***	0. 01(0. 01)	0. 96 ***	0. 00(0. 01)
education	1. 10 ***	0. 01(0. 01)	1. 07 ***	0. 00(0. 01)	1. 06 ***	0. 00(0. 02)
people	1. 07 ***	0. 00(0. 01)	1. 11 ***	0. 00(0. 02)	1. 10 ***	0. 01(0. 03)
health	0. 93 ***	0. 01(0. 01)	0. 94 **	0. 02(0. 02)	0. 95 *	0. 08(0. 04)
income	1. 00 ***	0. 00(0. 01)	1. 00 ***	0. 00(0. 01)	1. 00 ***	0. 00(0. 01)
farm	1. 00	0. 65(0. 01)	1. 00	0. 23(0. 01)	1. 00	0. 89(0. 01)
scale	1. 05 *	0. 06(0. 05)	1. 15 ***	0. 00(0. 06)	0. 86	0. 56(0. 09)
house	-0. 81 ***	0. 00(0. 06)	-0. 72 ***	0. 01(0. 06)	-1. 02 *	0. 08(0. 35)
risk	0. 90 ***	0. 01(0. 01)	0. 90 ***	0. 01(0. 02)	0. 89 ***	0. 00(0. 04)
happiness	0. 91 ***	0. 00(0. 02)	0. 96	0. 91(0. 03)	0. 78 ***	0. 00(0. 05)
trust	-1. 05 **	0. 03(0. 02)	-1. 08 ***	0. 00(0. 03)	-0. 98	0. 76(0. 04)

注:符号***、**、* 分别表示在 1%、5% 及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 4 家庭商业保险持有量占比影响因素概况

变量 标准	全样本		城镇		农村	
	系数	P 值(标准误)	系数	P 值(标准误)	系数	P 值(标准误)
sex	0. 03 ***	0. 00(0. 01)	0. 02	0. 45(0. 01)	-0. 01	0. 69(0. 02)
job	0. 12 **	0. 03(0. 01)	0. 08 ***	0. 00(0. 02)	0. 04 **	0. 04(0. 02)
marriage	0. 04 **	0. 02(0. 02)	0. 07 ***	0. 00(0. 02)	0. 03	0. 15(0. 04)
age	0. 01 *	0. 07(0. 01)	0. 01 ***	0. 00(0. 01)	0. 02 ***	0. 00(0. 01)
education	0. 03 ***	0. 01(0. 01)	0. 03 ***	0. 01(0. 01)	-0. 02 ***	0. 00(0. 02)
people	0. 02 ***	0. 00(0. 03)	0. 03 ***	0. 00(0. 01)	0. 01 ***	0. 01(0. 01)
health	0. 03 ***	0. 00(0. 03)	0. 03 ***	0. 01(0. 02)	0. 04 ***	0. 00(0. 05)
income	0. 01 ***	0. 01(0. 01)	0. 01 ***	0. 00(0. 01)	0. 01 ***	0. 00(0. 01)
farm	0. 01	0. 16(0. 01)	0. 01	0. 78(0. 01)	-0. 01	0. 38(0. 01)
scale	0. 13 ***	0. 00(0. 09)	0. 12 ***	0. 01(0. 02)	0. 14	0. 19(0. 01)
house	-0. 07 ***	0. 01(0. 02)	-0. 03 **	0. 04(0. 02)	-0. 17 ***	0. 00(0. 05)
risk	0. 01 **	0. 02(0. 03)	0. 02 ***	0. 00(0. 01)	0. 01	0. 63(0. 01)
happiness	0. 04 ***	0. 00(0. 05)	0. 04 ***	0. 00(0. 01)	0. 04 ***	0. 00(0. 01)
trust	-0. 01	0. 67(0. 04)	-0. 01	0. 90(0. 01)	-0. 01 *	0. 08(0. 01)

注:符号***、**、* 分别表示在 1%、5% 及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况对家庭商业保险持有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房屋是否租住对其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均与预期方向一致。分样本来看,城镇家庭样本与全样本表现一致,但农村家庭样本则在负债情况方面表现不显著,其主要受到年收入及房屋是否租住两大因素的影响。

④户主主观态度方面,风险偏好度及幸福感均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商业保险持有行为,而社会信任度仅在商业保险持有广度方面表现出显著负向影响。在这一主观因素方面,城乡家庭样本间表现出了巨大差异性。综合商业保险持有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来看,城镇家庭更容易受到风险偏好度的正向影响,而农村家庭则更多的会受到幸福感的正向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利用 2013 年 CHFS 全国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我国商业保险市场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并对家庭商业保险持有的广度及深度进行实证

分析。

1. 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家庭商业保险持有行为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且城乡家庭间存在一定差异。其中,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健康状况、年收入及房屋是否租住 6 个因素对各类家庭均具有显著影响。从城乡样本来看,城镇家庭受影响因素更加多样化,由于城镇家庭受教育程度及年收入等普遍高于农村家庭,其更有能力投资商业保险,因此在家庭拥有商业保险占比方面也高于农村家庭。城镇家庭在商业保险持有行为影响因素方面也比农村家庭更多样化,更多受到婚姻、负债及风险偏好度的显著正向影响,而农村家庭则受到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更多。

2. 政策建议

首先,不断提升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尤其注重提升农村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此次研究发现户主的

受教育程度是家庭商业保险持有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虽然我国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但部分偏远农村地区依然无法达到正常的受教育年限,部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城镇家庭及大部分的农村家庭对保险产品缺乏了解,导致这部分群体对商业保险产品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和抵触。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定期组织人员,通过外展、讲座及举办免费培训班等形式推广保险知识,全面提升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金融知识水平。

其次,促进家庭收入平稳增长。家庭收入不断增长将有助于减轻家庭负担,使得家庭有意愿也有能力购买商业保险,追求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来分散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同时,家庭收入不断增长,可以使得居民改善健康状况,而健康状况对家庭商业保险持有的广度和深度都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

第三,根据城市和农村家庭的不同特点精准营销。从实证分析结果看出,城市家庭更倾向于购买商业保险,保险公司可以加大宣传力度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保险公司应当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创新,经济能力差的家庭更需要保险作为分散其未来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风险的手段,可以针对这类客户群体设计出适合他们的产品,保险推销员应当根据客户经济状况、自身需求等因素为其介绍适合的保险产品,农村家庭较城镇家庭收入水平更低,家庭承受力更差,应当主要向他们推荐低成本的保险产品。

最后,引导和鼓励更多居民参与商业性养老保险。目前,我国老年人的总体收入水平和储蓄水平偏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老年人有支付能力的现实消费需求的扩大。与此同时,居家养老、家庭供养、退休金和养老金养老是主要的养老方式,随着子女自身生活负担和赡养老人生活负担的加重,必然会逐步出现养老的社会化趋势。这就需要引导有经济实力的人购买商业性养老保险,保障退休后的生活质量。保险公司要积极做好老年人资产的委托投资和管理服务,依据保险标的属性、支付能力、可保保费和风险程度等设计多样化的保险产品,以促进养老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MICHEL K E, RASCHKY P, KUNREUTHER H. Corporate demand for insurance: new evidence from the U. S. terrorism and property markets[J]. Journal of Risk & Insurance,2014,82(3):505-530.

[2] ALBOUY F X,BLAGOUTINE D. Insurance and transition economics;the insurance market in Russia[J]. Palgrave

Macmillan Journals,2001,26(3):467-479.

[3] SHOWERS V E, SHOTICK J A. The effects of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on demand for insurance; a Tobit analysis [J].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1994,61(3):492-502.

[4] DURLAUF S N. Neighborhood effects [J].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2004(4):2173-2242.

[5] BERNHEIM B D,GARRETT D M.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education in the workplace: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household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3, 87(7):1487-1519.

[6] SCHMIDT-HEBBEL K. Does pension reform really spur productivity, saving and growth [R]. Working Papers Central Bank of Chile,1999.

[7] LUSARDI A. Financial literacy and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in older adults[J]. Generations,2012,36(2):25-32.

[8] 孙伟,HO C K,王萍. 房价波动对人身险需求的影响 [J]. 保险研究,2013(10):48-57.

[9] 赵红梅,苏慧娟. 我国财产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地区加权和时间加权的面板数据[J]. 保险研究,2013(2):38-44.

[10] 孙正成. 需求视角下的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研究——基于浙江省 17 个县市的调查[J]. 中国软科学,2013(11):73-82.

[11] 黄瑞芹. 农户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行为与潜在需求差异分析[J]. 世界经济文汇,2013(6):101-109.

[12] 龙梦洁.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商业保险对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作用[J]. 保险研究,2007(8):30-32.

[13] 杨宇. 面对人口老龄化——中国商业保险转型发展策略探讨[J]. 上海保险,2014(3):17-21.

[14] 李强,刘敏. 商业保险参与养老失业的效率和形式——基于 OLG 模型的分析[J]. 社会保障,2015(9):63-68.

[15] 刘敏. 养老事业中商业保险的经济效率研究——基于 OLG 模型的分析[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41(8),151-158.

[16] 甘犁,尹志超,贾男,等. 中国家庭资产状况及住房需求分析[J]. 金融研究,2013(4):1-20.

[17] 傅一铮,苏桂芳. 中国城乡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影响因素分析[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16(5):17-28.

[18] 黄亚林. 农业保险需求方利益实现的实证分析[J]. 调研世界,2014(4):30-33.

[19] 秦芳,王文春,何金财. 金融知识对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2016(10):143-158.

[20] 王目君. 我国城市居民就医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五城市实证分析[D]. 济南:山东大学,2008.

[21] 吴卫星,齐天翔. 流动性、生命周期与投资组合相异性——中国投资者行为调查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2007(2):97-110.

(责任编辑:高虹)